

# 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述评

蔡 罕

**摘 要：**文章从三个方面述评了活跃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一是述评了从《时事简讯》到《新浙东报》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报事业的成长与发展；二是述评了《战斗报》、《解放周报》的创办对浙东抗战并取得胜利所起的宣传与鼓动作用；三是述评了浙东印刷厂与浙东韬奋书店对浙东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时事简讯》；《新浙东报》；《战斗报》；《解放周报》；浙东印刷厂；浙东韬奋书店

**作者简介：**蔡罕，男，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教务处，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3-0062-08

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始于1941年，是抗战时期中共创建的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它东临东海，西跨浙赣线金萧段两侧，南达东阳、宁波公路一线，北达黄浦江东岸，形成了以四明山为中心，地跨杭州湾两岸，总面积达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400余万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其新闻出版事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对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与建设事业起着重要的新闻传播、宣传鼓动与工作指导作用。因此，系统地梳理与研究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对于进一步深化浙江地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本文拟从中共浙东区党委的机关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军报和根据地的出版发行机构等3个方面，对浙江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进行述评。

## 一、从《时事简讯》到《新浙东报》：中共浙东区党委党报的创办与发展

1941年4月中旬开始，日军发动宁绍战役，浙东大片领土沦陷。5月中旬，国军奋起抗争，陆续收复了温州、台州、诸暨等地，与日军形成对峙，但浙东抗战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这时，毛泽东等电示华中局要增派干部到浙闽沿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强调“此区大有发展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sup>[1]</sup>根据这一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指示浦东工委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发展。5月至9月，中共浦东抗日武装900余人分批南渡杭州湾，到达三北（姚北、慈北、镇北）地区，创立了三北抗日根据地。次年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由于三北地处敌伪以及当地土匪围攻的复杂环境，消息十分闭塞。为了粉碎敌人的新闻封锁，1941年夏秋之间，区党委决定建立新闻电台，并将接收的延安新华社和重庆中央社的电讯选编成《电讯稿》，油印后分送区党委领导、部队首长，以供参考。电台的建立和《电讯稿》的编发，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

1942年7月，根据浙东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浙东区委宣传部决定在《电讯稿》的基础上创办《时事简讯》，社址初设慈北上岙何家桐山寺。初创之时的《时事简讯》以8开4版或6版的小报形式油印出版，每周一期，主要刊登延安新华社和重庆中央社播发的两种电讯稿。

1942年秋，浙东游击队在“三北”地区反扫荡三战三捷后，又在反顽自卫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两千人左右，并挺进到四明山区，《时事简讯》也“从镇北的任家溪山上转移过姚江到

‘南山’上黄一带山沟里”<sup>①</sup>，由陈静之担任社长，报社的机构由编辑股、电台、总务股三个部分组成。当时，四明山区的办报条件十分简陋，工作相当艰难。敌伪对运往四明山根据地的各类物资都严加封锁，印刷的纸张也曾遇到困难。

1943年，随着四明山根据地的进一步扩大与地方机构的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华社华中分社决定成立新华社浙东支社（5月，改为“新华社浙东分社”），委派于岩为社长。2月，浙东区党委加强了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工作。在《我党我军在浙东地区今后的一般任务》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时事简讯》的领导”，使之“成为我党对外的一个言论机关。”<sup>[2]</sup>这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时事简讯》的办报水平。显然，印量有限的油印技术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改油印为铅印则势在必行。1943年7月7日，《时事简讯》改为铅印，每周两期，周三、周六出版，每期4开4版，偶至6版或8版，发行量也很快增为数千份。其内容除转载延安电讯稿外，还增加了评论和副刊，报道浙东敌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与此同时，《时事简讯》发行的范围也扩大了，除了根据地，它还通过各种渠道分发到敌占区，甚至送进了宁波市内。这不仅鼓舞了浙东游击根据地战士和人民的士气，也使敌伪大为震惊，反动的《宁绍台日报》曾多次刊登攻击《时事简讯》的言论。

1943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浙东根据地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撤离梁弄横坎头。11月16日，报社也随党政机关转移到三北，报纸重新改为油印，继续出版。1944年4月，《时事简讯》因《新浙东报》的创办而停刊。

在《新浙东报》创办之前，浙东抗日根据地曾于1943年6月试刊过不定期的、铅印的《浙东报》。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综合性报纸。11月，由于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的爆发，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被迫转移，该报停刊。

1944年3月，随着反顽斗争形势的好转，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工作也出现转机。4月，浙东区党委根据抗日反顽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作出“关于出版《新浙东报》与加强报纸工作的决定”，将《时事简讯》改为《新浙东报》，“并明确决定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sup>[3]</sup>。为加强党报的领导，区党委专门成立了由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以及张瑞昌、江岚等5人组成的“党报委员会”，谭启龙任主任。4月13日，《新浙东报》在慈北创刊，社长张瑞昌，副社长兼总编辑于岩（一说于岩为社长）。该报由浙东书局（后改为“浙东韬奋书店”）总发行。每期铅印4开4版，偶扩6至8版，逢周一、周四出版。9月，《新浙东报》从每周2期改为每周3期。次年8月17日，在抗战胜利后改出日报。10月2日停刊。总共出版231期，增刊18期，号外数期。发行量1500—4000份。

除了上述两报，中共四明地委在1945年1月24日出版了《学习与工作》（不定期刊物）。4月，中共浙东区党委创办了《团结》党刊（共出2期）。同月，“东南文化社”出版了《东南文化》月刊。9月，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新华社浙东分社联合主办了《做学写》周刊。由于办刊时间不长，或不定期，影响均不大。

《新浙东报》的创办，适应了当时抗战形势发展的新的需要。正如《新浙东报》发刊词《我们的立场与态度》所说：“今天，世界与中国正在向着一个自由民主的完全新的伟大历史时期迈步前进。……

① 钟虹，陈树德，鲁明，董大栋：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 [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话录 [C]．内部资料，1986：109．

在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历史事变面前，我们浙东共产党人感到无限的兴奋，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并愿表白我们对当前时局的立场与态度以及我们创办这个报纸的用意与希望”<sup>[4]</sup>。与《时事简讯》相比，《新浙东报》在办报的指导思想、新闻报道与抗日反顽宣传，以及对浙东根据地建设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新浙东报》的创办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党报的领导，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思想与工作方法。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的《解放日报》经过“整风运动”和改革，提出了“全党办报”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浙东报》得到了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谭启龙同志经常亲自检查与确定每一时期报纸的政治方针，并带头撰写社论、重要新闻等。浙东区党委还发出文件，“特指定各地委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各支队宣传股长、大队教导员、……凡为党员者，均为‘新浙东报’之当然通讯员”<sup>[3](168)</sup>。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也发布了《通令》，具体规定各单位要指定专员负责发行和推销工作，要求发行到各基层单位，各地区的市集和要道等处张贴《新浙东报》至少5份。负责发行书刊的浙东书局，在梁弄、张家埠等重要市镇上开设书店门市部外，各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发行机构。这对加强《新浙东报》的政治宣传工作与扩大社会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新浙东报》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区党委的中心工作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份报纸，《时事简讯》记录和见证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反顽的艰苦斗争岁月，“在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上，在团结争取与教育浙东敌后各阶层人民上，在反映浙东党的工作与群众的要求上，以及在帮助全党全军的政治教育与思想上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主客观各种因素的限制，当时《时事简讯》只“部分的完成了党报的任务”。<sup>[3](167)</sup>《新浙东报》创办后，注重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配合浙东区党委的中心工作，在根据地的建设上发挥出更好的宣传与鼓动作用。《新浙东报》创办不久，中共“七大”召开，《新浙东报》即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七大”召开的消息和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发表了许多有关宣传“七大”精神的文件。当时，浙东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浙东报》积极配合，就此专门发表社论，刊登政令，在做好各项政策宣传的同时，还派记者深入到各游击区，采访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推广工作经验。1944年春耕之际，浙东区党委、临时行政委员会为胜利坚持敌后抗战，作出关于展开春耕运动的训令，为此，《新浙东报》于4月27日发表社论《努力春耕，保证军民一年计划》，指出根据地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帮助农民实行生产自救，军队既是战斗员，又是生产者。5月1日又发表《进一步把战斗与劳动结合起来》的社论。与此同时，《新浙东报》还开辟“生产专刊”，发布春耕运动的训令，发表介绍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经验的文章与模范事迹的通讯。同时，《新浙东报》还进一步发挥了党报在浙东人民抗日斗争中的指导作用。当时报上“大量报道了军民齐心合力，抗击敌伪军的战绩，像《解放周巷》、《上虞解围之战》、《杨奚舍身烧碉堡》等，写得有声有色”<sup>[5]</sup>。这些都表明《新浙东报》提高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报的办报水平，在贯彻中央指示、配合浙东区党委与行政的中心工作与宣传、指导浙东人民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新浙东报》的内容与形式更为丰富，专栏、副刊更具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地方特色。《新浙东报》在内容上不仅能及时转载党中央的文件和新华社发布的国际国内重要新闻电讯，而且还运用消息、评论、人物访谈、战地通讯等形式，重点报道浙东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动态及全省重要的抗战新闻，对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的报道都更为详尽。同时，《新浙东报》的栏目也更为丰富，辟有“新地”、“浙东妇女”、“新时期”、“浙东青年”、“文艺周刊”、“新文教”等副刊和“生产专刊”。这些栏目、专刊积极配合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对敌斗争，做好

敌后抗战宣传工作；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方针，揭露国民党反动势力破坏抗战、发动内战的罪行；同时配合浙东区党委做好根据地生产建设，较好地反映出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建设和文化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浙东妇女”副刊，在宣传和指导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方面就显得较有特色。其在《创刊前言》中就明确提出：“希望姊妹们把《浙东妇女》当作自己解放的旗帜，让它高高举起，走在浙东妇女大众漫长的战斗行列的前头”<sup>[6]</sup>。同时，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紧紧围绕着妇女的生活、工作、学习和自身解放发表评论、诗歌、散文等，反映出《新浙东报》重视宣传妇女和支持根据地妇女工作的特色。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浙东人民欢呼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阴谋发动内战。为顾全大局，党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干部迅速北撤。10月1日《新浙东报》在发表《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后停刊。为了使留下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能够及时了解全国和解放区的情况，于岩社长给留守四明山的乐子型等同志留下了一部电台，继续抄收新华社电讯。正是这部电台和留守的同志，保存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工作的革命火种，并燃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四明山游击区新闻事业的熊熊大火。

## 二、《战斗报》、《解放周报》：高举抗战大旗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报

《战斗报》创刊于1943年8月，是三北游击队（1944年1月5日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的机关报。创刊初期是油印小报，8开4版，每周出版一期，报头由司令员何静（即何克希）题写。该报开始在三北地区出版，后迁到四明山区。1943年11月，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开始后，由于战斗频繁，部队在转移中因油印器材丢失而停刊。

1944年春随着反顽斗争局势的好转，《战斗报》于3月21日复刊，出版新1号，并改用铅印出版。社长江岚，主编丁柯。新版《战斗报》每期8开4版、6版或8版，有的专号（快报）多至18版、20版。从第15号起改为每周出版两期。第一版主要为“社论、战斗新闻、命令、嘉奖”；第二版为“通讯、首长讲话、专题”；第三版为“经验交流”等；第四版是副刊，刊载“文艺作品”<sup>①</sup>。浙东纵队的木刻家洛井还专门为报纸创作报头与插画。

复刊后的《战斗报》发展迅速，其“发行量从300份增至800份”。办报人员也由开始时的“只有三个人”，“发展到一二十人”。报社还“设有单独的电台，有译报员，每个支队（团）都有一个特派记者”<sup>②</sup>。

《战斗报》复刊后，得到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在《战斗报》复刊时曾发布《训令》，指出：“战斗报是部队中的党报，是党在部队中实施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是教育部队（发扬模范，批评弱点，介绍工作与战斗经验，鼓励全军斗志）的重要武器。”这对《战斗报》的性质和作用作了明确的指示。《训令》还对本报的编辑、写稿、发行、读报、保密等方面，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政委谭启龙还在刊头上题字：“党报是我们的教科书”。为了加强全军指战员的学习，纵队又发出《通知》，强调《战斗报》要“多注意反映与指导学习”，“各单位各同志必须深刻注意战斗报上有关学习的社论、首长论文以及学习方式方法、经验介绍等文章”。这对发挥战斗报的宣传与教育作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① 丁柯．回忆《战斗报》[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C]．内部资料，1986：125．

② 周律之．宁波报刊史[Z]．内部资料，2003：59．

作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机关报,《战斗报》具有鲜明的军报色彩,它对浙东游击纵队的宣传与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战斗报》辟有“战斗俱乐部”、“文艺通讯”、“战士习作”、“军事常识”、“生产常识”、“生活常识”等栏目,其稿件主要来自游击纵队的战士与干部,当时每个连队都有一个通讯小组和几个通讯员。这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报纸的稿源,而且也使《战斗报》刊登的新闻报道与作品有着浓厚的部队生活气息,反映着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日反顽岁月中的战斗生活,以及生产、学习的情况。主编丁柯回忆说:通讯员“伊兵、陈山、胡野擒等同志都给报纸写过‘的笃班’(越剧)调子的稿子,深受战士欢迎”<sup>①</sup>。可见,这些由连队通讯员写的文章形式多样,令人喜闻乐见。同时,这些反映浙东游击队的宣传报道,也“使地方上的党员同志们对党的部队有了更加亲密更加深刻的认识,相当的提高了他们的拥护精神”<sup>[7]</sup>。

其二,每一次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斗结束,《战斗报》均以各种文字形式,及时地反映我军的战果,总结战斗经验,并编写了许多生动的战斗故事。战斗报社还编辑出版过木刻连环画《血战大渔岛》。该连环画反映了1944年8月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奉命派出一中队指战员于杭州湾口子外的大渔山海岛开辟海上根据地,准备接应美国盟军登陆,因叛徒告密,遭七八倍于己的日伪军包围而展开激烈血战的战斗事迹。这些报道对于提高士气,振奋部队的战斗精神,都起着生动的活教材作用。

其三,战斗报社还出版过供给干部学习的军政杂志《战斗》半月刊,配合部队整训政治工作的《整训号外》,以及作为连队文化课本用的《文化战士》等。这些刊物、宣传资料是《战斗报》的有机组成,它对于搞好浙东游击纵队的思想政治与宣传教育工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945年9月底,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战斗报》停刊,共出一百零几期。北撤后,《战斗报》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前锋报》。

此外,《解放周报》也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一份重要军报。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为了进一步瓦解浙东日军,1月16日,在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和敌工部的领导下,由“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主办的日文版《解放周报》创刊了。该报8开4版,黄源、楼适夷等负责编写,由反战人员(原日军官兵)吉永寿、栗原、田中等任日文翻译。《解放周报》主要是向日本侵华官兵宣传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反对日本侵华战争,曾连续刊登日本共产党驻华代表冈野进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题为《民主日本的建设》的长篇演说。该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送到驻宁波、余姚等地的日军官兵手中,这对分化、瓦解敌人起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以《战斗报》、《解放周报》为代表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报,高举抗日大旗,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三、浙东印刷厂、浙东韬奋书店:烽火中成长的浙东根据地出版发行机构

自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份报纸《时事简讯》创办后,根据地的书报是靠油印来出版的。这种印刷技术相对落后,一张蜡纸刻写后一般只能印几百张报纸,要增加报纸的发行量,只能增刻蜡纸,多费几倍的人力、物力。因此这种油印出版只能是根据地报纸初创时期的权宜之举。1943年,随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四明山区的扩大与地方政权机构的发展,浙东区党委对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改油印为铅印,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与发行量则势在必行。

① 丁柯.回忆《战斗报》[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C].内部资料,1986:125.

1943年4月至5月，浙东印刷厂开始筹建。当时，在余姚城郊的一个破庙里存有原国民党报纸印刷厂的设备，在部队的掩护下，这批设备被抢运到南山乡杜徐岙山上的泥屋里小村。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与报社同志的努力工作下，终于在1943年“七一”这一天，试印出了第一份文件。7月7日，将原油印的《时事简讯》改为铅印。至此，浙东印刷厂的筹建工作胜利完成。

在浙东根据地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浙东印刷厂要坚持正常的工作运转，完成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交付的印刷任务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敌伪对浙东根据地的封锁和物资的禁运，造成了印刷器材与印刷原料的匮乏。浙东印刷厂建立后，印刷器材相当缺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地派人去上海采购急需的新五号铜模、铸字炉，以及油墨、白报纸等。但是这些都是被敌伪禁运的物资，根据地的采购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地下工作同志的帮助下，打通各种关节，才能采购到手，而要把这些物质安全地运输到根据地则更是件万分危险的事。

其二，浙东抗日根据地恶劣、复杂的斗争环境，迫使浙东印刷厂分散迁徙，并在地下秘密地、艰难地从事出版工作。1943年冬，国民党顽固派调集了两万多人马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敌顽采取步步为营、筑垒挺进的战术，向四明山根据地中心进逼。当时环境十分恶劣，为使根据地书报的出版发行不受反顽斗争的影响，浙东印刷厂在上级的领导下，将部分印刷器材转移到三北，并在慈溪“石步毛山”建立了分厂。为了防范敌人的搜山扫荡，大家挖地四五尺，将厂房的大部分埋设在地下，只将少部分露在地面。“深挖洞”方便了隐蔽，却也增加了印刷工作的难度与生活的困难。一是厂房深埋地下，没有窗户，车间“光线很差，排字只能在蜡烛光下进行”；二是“没有切纸机，也没有切纸刀”，切纸工人“只得用菜刀”将一令令纸切割成8开或16开，“即使天冷时也累得满头大汗”；三是“山上的蚊子又大又多，还有各种毒虫的叮咬，坐着不动的校对同志从头到脚都叮得难以忍受，身上到处是疙瘩和水泡”；四是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吃的是“咸菜豆瓣、咸菜洋山芋、盐炒萝卜菜”，难得吃上一顿猪肉。<sup>①</sup>而当时最危险的事情则是要躲避敌人的搜山扫荡。正是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下，三北印刷分厂克服重重困难，坚忍不拔地坚持着出版工作。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直到1944年春夏之间，随着反顽斗争形势的好转才有所改变。当时，根据地领导决定恢复原南山印刷厂。10月，又将三北印刷分厂与南山印刷厂合并。之后，浙东印刷厂的设备逐步得到完善，人员也逐渐充实，印刷能力日益扩大。1945年春节后不久，浙东印刷厂“分成三个厂”，“一个厂仍印报纸，一个厂印党的文件和政治书籍，另一个厂印军用地图、粮票、石印布告等”，同年3月，又改以印“浙东抗币”为主了。此后浙东印刷厂的三个分厂各司其职，印报纸的分厂主要负责《新浙东报》、《战斗报》的印刷；负责印文件与书籍的分厂则印制了不少图书和工农兵通俗读物。其中，“《政治常识》、《根据地建设》及《血战大渔岛》等几本图书均为根据地同志们自行编写的”。其他大部分图书是“由兄弟解放区提供样本，也有上海的生活、新知、读书生活出版社提供的，由浙东印刷厂翻印出版”。这些图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册至3000册，印数最多的是宣传部张瑞昌部长编写的《政治常识》，“再版了两次”，战士们“几乎人手一册”<sup>②</sup>。

尽管当时白报纸采购不易，为了便于读者保存，当时印刷厂的印书用纸“全部采用白报纸印刷”。

① 钟虹，陈树德，鲁明，董大栋．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话录〔C〕．内部资料，1986：113．

② 钟虹，陈树德，鲁明，董大栋．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话录〔C〕．内部资料，1986：115．

为适应战争环境,在携带中不易损坏,像《根据地建设问题》、《整风文献》和《政治常识》这几种多达数百页的厚书,在装订时就“用布做书脊”。“《政治常识》还用48开袖珍本出版”,便于干部、战士随身携带。

1944年5月浙东印刷厂还印过日文刊物《解放周报》。由于没有日文铅字,当时印刷厂专门派人去上海,在地下党的协助下购置了三副日文铜模(2号、4号、新5号),才得以完成印刷出版的任务。

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浙东区委宣传部决定将负责印报与印书的两个印刷厂立即合并,并下山建厂,“厂址设在袁马”。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新浙东报》发行量大增,且在8月17日起改为日报。为了准备接管余姚、慈溪、宁波等城市,印刷厂还增设了副厂长、政治指导员及工务主任,并设立了排字、印刷、校对、装订、石印、铸字和总务等各股。<sup>①</sup>但此后不久,浙东游击纵队就接到北撤的命令。浙东印刷厂在完成《新浙东报》终刊号“告别书”的印刷任务后,拆卸并掩埋了印刷机器,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浙东韬奋书店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发行机构,其前身是浙东书局。浙东书局成立之前,根据地没有专门管理出版发行的机构。1944年夏,浙东游击纵队取得了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四明山根据地和三北游击区已连成一片。为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是年8月,浙东区委宣传部召开了浙东宣教会议后,即成立了浙东书局,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直接领导。

1945年春节,浙东区委在宣传工作上决定:为了纪念邹韬奋的逝世,把浙东书局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并任命诸克为经理,陈永年为副经理。当时,区党委还将浙东根据地的发行总部、印刷厂和造纸厂统一归韬奋书店领导。这里主要阐述浙东韬奋书店对浙东根据地书报发行工作的作用。

浙东韬奋书店对书报的发行工作主要采取了“送”与“售”两种方式。所谓“送”,就是用人力肩背、担挑,及时将书报送至各部队驻地和地方组织。为了使浙东根据地和游击区军民能及时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解放区不断取得胜利的喜讯,韬奋书店对报纸的发行“努力做到随出随发”。当时,书店发行总部的十余个通讯员,“大多是十三至十六岁的小同志”,但是“他们机智勇敢,不分昼夜,不畏烈日严寒,风雨无阻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天天把报纸送到各部队驻地和各地方组织”。有时书店的工作人员也“乔装成商人或山民,挑着夹有书报的锅盖、木桶等山货,送到石步村再转各地,待发出了书报后再将山货挑到街上卖掉”。所谓“售”,就是建立韬奋书店门市部,以销售的方式发行和出售图书与报刊。这种发行方式往往是用在根据地或新解放的城镇。当时“浙东韬奋书店”的各发行分部“凡设立门市部的”,都有浙东根据地“自己印的图书”及“上海版的进步图书供应”<sup>②</sup>。

随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形势的发展,韬奋书店的发行范围也逐步扩大,书店的门市部也不断地增加。每当部队攻下一个城镇,就在该城镇开设一家书店门市部(对外都称“浙东韬奋书店”,对内是发行分部)。尽管开设的店面十分简陋,但在浙东的山沟小镇能见到新书店,“书又都是放在柜子上”,因此很吸引读者。当时光顾书店的读者除了干部、战士,“许多老百姓也争着来看书、买书”。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东韬奋书店”有“‘三北’、‘余上’、梁弄、章家埠、‘嵊新奉’、上虞(丰

① 钟虹,陈树德,鲁明,董大栋.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C].内部资料,1986:119.

② 钟虹,陈树德,鲁明,董大栋.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C].内部资料,1986:117.

惠)、鄞西等七八个发行分部,初步形成了发行网”<sup>①</sup>,这对于浙东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事业的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发行总部内部也健全了组织机构,设立了业务、出版及财会各股。由于书店是经营性的单位,但是当时大多数同志不会理财,浙东根据地当时就采取了“随教随学的办法,自力更生培养干部”。1944年冬和1945年上半年,曾办过两期短训班,学员结业后就充实到发行队伍里去。这对于根据地发行人才的培养起着较好的作用。

总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是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出版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当时根据地的环境十分恶劣,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其所办的抗日救亡报刊和出版发行机构始终坚持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方针。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坚持敌后抗战,获取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东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5.

[2]我党我军在浙东地区今后的一般任务[A].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下)[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68.

[3]浙东区党委关于出版《新浙东报》与加强报纸工作的决定[A].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下)[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167.

[4]佚名.我们的立场与态度[N].新浙东报,1943-04-13(1).

[5]何守先.宁波新闻纵横[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241.

[6]佚名.创刊前言[N].新浙东报,1944-04-20(1).

[7]张瑞昌.《战斗报》做了些什么?还应该做些什么?[N].战斗报,1944-05-13.

<sup>①</sup> 钟虹,陈树德,鲁明,董大栋.追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A].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C].内部资料,1986:118.